

香港性行業多元化，改善政策必須具針對性

蔡玉萍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一連串針對性工作者的暴力案件反映的除了是這個社群的高危工作環境，還有社會對他們的標籤和污名化 (stigmatization)。在香港社會，性工作者被看成是道德淪落的一群。我們從 2003 年開始在中國大陸，澳門和香港訪問了超過三百名低下層的性工作者 (大部份是在髮廊，按摩店，一樓一，和街頭工作)。這些女性絕大部份都是因經濟原因和生存需要而從事性工作。她們很多來自中國的農村。在中國經濟急速發展下，城市和農村的貧富差距不斷增加；當中國社會越來越富有的同時，國家卻大幅減少在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的承擔。中國社會的急遽變遷又進一步造成家庭的解體，很多女性在離婚後都要獨力負起照顧兒女的責任。香港的數字我們暫時未有，但我們在中國對二百名低下層性工作者進行的一個調查就發現，超過七成的性工作者每月匯錢照顧家人，四成育有孩子並負起養育孩子的責任，有兩成是離婚人士。這些數字表明，很多性工作者用自己辛苦工作換來的金錢照顧家人。但在主流的性規範和對女性的雙重性道德標準下，她們連最基本的人權和尊重有時也得不到。性工作者在遭受暴力威脅時，很少向執法機構求助。這並不是因為她們怕事，也不全因為是法律問題，而是她們意識到社會對這個行業的污名化，認為社會不會認真看待她們受到的不平等對待。因此要協助這邊緣社群，首要是改變社會對她們的偏見。執法人員亦是大社會的一份子，他們對性工作者的態度很多時是大社會偏見的一面鏡子。

香港性行業多元化，政策必須具針對性

香港的性行業非常多元化，提供性服務的場所包括高級夜總會，舞廳，私人會所，酒吧，卡拉 OK 吧，按摩院，女子理髮店，一樓一，街頭和互聯網上的交易平台。在不同場所工作的性工作者的個人背境有明顯差異，工作環境不同，面對的問題及需要亦有分別。縱觀不同場所的性工作者，一樓一和街頭性工作者 (俗稱企街) 收費較低，年紀普遍較大，議價能力較低。她們的

客人品流複雜，面對的暴力和健康風險亦最大。事實上，雖然今次幾個命案的受害者都是在一樓一工作的女性，但其實街頭性工作者受暴力的風險亦是非常高。青島在零六至零七年進行的一個調查就發現，在受訪的 30 個街頭性工作者中，客人拒絕使用安全套，拒絕付款，被客人暴力對待，和被人行劫的比率分別為 57%，33%，1%，和 33%。

一樓一和街頭性工作者的工作環境相對孤立無援。大部份一樓一的性工作者都是以自僱形式經營。街頭性工作者則有兩種，包括自僱人士和以分帳形式與中間人(俗稱馬伕)合作的女性。後者大都是拿 14 天雙程証從中國來港工作的女性。自僱的性工作者可免除與中間人分帳和受中間人剝削操控的問題，但卻要單獨面對不同的客人和更高的健康，暴力和法律風險。例如自僱的街頭性工作者並沒有馬伕代為拉客，她們拉客時就可能被告“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因為性行業中的層級化和不同種類性工作者的處境迥異，社會在進一步討論如何協助改善這個社群所面對的問題時，不能再將其視為鐵板一塊，政策必須具針對性。

在香港從事性工作和向性工作者購買性服務都不屬違法。但法例卻**嚴禁性工作中介人的存在，對經營，管理和協助管理性交易場所亦全面禁止**。這些法例原意是要杜絕操控和逼迫婦女提供性服務。在九十年代很多歐美國家有關性工作的法例亦與香港現時的法例大同小異，但現時澳州，德國和荷蘭已對相關法例作出多方面修改，如**規管而非全面禁止經營性交易場所和正規化性交易中介人的存在**。香港在討論現時條例的問題時，可以參考外國的經驗。當然每個地區的情況不盡相同，不能全盤照搬。事實上關於性工作的法律討論牽涉問題複雜，因有相當一部份性工作者並非本港居民，亦不擁有在本港工作的權利，她們的處境比本地的性工作者可能更惡劣。規範化了性工作行業亦不一定能協助這群女性。縱然問題複雜，但這次的四個命案清楚說明，深化的討論和改變是必須的，因牽涉其中的是人的基本生存權。